

第一章

先亲后疏,患难之交张静江

张静江和蒋介石相识很早，本是拜把子的盟兄弟，并在经济拮据时曾经共同在上海做投机生意。但在蒋介石发迹之后，二人的关系却出现裂痕，渐行渐远。个中缘由何在？除了“时位之移人也”的古训在起作用外，也与蒋、张二人的性格和为人处世习惯不同密切相关。

一、共谋财路，创设上海 证券物品交易所

大概是在 1916 年，孙中山先生为了筹措革命经费，采纳了日本某政党的建议，具呈向北京农商部申请在上海区域内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这个呈文是朱执信写的），经营证券、花纱、金银、杂粮、皮毛等五种，资金总额定为国币 500 万元。农商部当时只有“证券交易法”可资依据，依照该法规定，证券和物品不能同时交易，因此对孙中山先生的呈文未予批准。这件案子也就搁置下来，孙中山先生也未继续进行。

过了一年半载，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因为经济非常

拮据，共谋生财之道，乃利用前案，进一步与日本某政党所介绍的某企业代表协商关于开办交易所的具体办法以后，即着手进行。首先，他们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协进社”的秘密社团谋划其事；其次是拉拢虞洽卿、赵家艺、盛丕华、洪承祁等为社员，以扩大力量；最后又由虞洽卿等再拉拢当时上海工商界中所谓知名人十如温宗尧、闻兰亭、李云书、张澹如、沈润挹、吴耀庭、顾文耀等共任发起人，具呈向农商部申请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他们正在积极筹备之际，事为南通张謇所悉，通电反对。

张謇反对虞洽卿等创办交易所的原因，是由于他知道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易所均采一区一所制，政府若准许虞等创办在先，别人就不能在同一区域内再办；尤其是他在南通办盐垦多年，当时正种植棉花，而且大生纱厂也已开办起来，自己手中有花、有纱、有布，岂肯任人支配。他反对虞洽卿等创办交易所的理由有二：一是交易所既是一区一所，即不能多种经营，做了证券就不能再做物品，如单营物品，则做了棉花就不能再做纱布；二是交易所不能依靠外资作股本。在这样的情况下，虞洽卿虽有上海各业领袖和总商会的支持，但农商部也很难批准他的申请。实际上这是虞洽卿的多种经营与张謇的单种经营的争权夺利之争，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

日商于 1919 年在上海日领事馆注册，在上海租界三马路开办了“取引所”（即交易所）。虞洽卿便以抵制取引所为借口，电请农商部迅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案予以批准。同时，沪海道尹某也打了一个密电给北京说，关于虞洽卿申请创办交易所一案如再不批准，他们将在租界内先行交易，如地方官厅予以封闭，反使日商取得专利云云。事实上，虞洽卿也把交易所“先行交易”起来了。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为虞洽卿，常务理事为郭外

峰、闻兰亭、赵林士、盛丕华、沈润挹、周佩箴等六人。理事 17 人，我是其中之一。监察人是周骏彦等。陈果夫当时是第 54 号经纪人，他的老板就是蒋介石。经纪人头上戴白布帽子，帽上各编有号码，以资识别。经纪人卖出买进不拘若干次，成交须经拍板员拍板。以拍定之价格为计算标准，全场均须遵守，不得异议。

交易所的资金来源，据协进社社员说，当时协进社代表戴季陶与日商某企业代表商定办法，交易所资金确定为 500 万元，分为 10 万股，每股 50 元，用有限公司方式募集，如募不足额，可照票面向日商抵借款项，但以十分之七（即不超过 7 万股，350 万元）为限。交易所开办时，先收四分之一，即日方担任 87.5 万元，华方 3 万股担任 37.5 万元，共计 125 万元。协进社方面拿不出 37.5 万元的巨款，怎么办呢？有人代为设计：“日商 87.5 万元股款势必分存于华商银行钱庄，我们可先向这些行庄协商做 3 万股押股，如不接受此项条件，则日商的股款即不向他们的行庄存放。”这是以交易所名义的存款来做交易所股票的押款的办法。钱庄唯利是图，双方一拍即合。这样，交易所的 10 万股的股款，7 万股系日商代缴，3 万股系华商行庄代缴。对外来说，交易所 500 万元资本的四分之一，即 125 万元，都已全数缴足，分存于华商行庄。事情就是这样办成的。因此，交易所在开业以后，居然信用大著，营业一天好似一天，市场内人山人海，拥挤万分。

协进社为了使物品交易所成为合法经营的事业，于 1920 年年初派社员洪承祁来甬邀我同虞洽卿赴京向农商部交涉，质问为什么日商可以在上海办取引所，而中国人反不能在上海办交易所。洪承祁对我说，协进社在 3 万股股票中分给我 1000 股，原须缴股款 12500 元，因恐我一时不便，已代做押款 10000 元，现在只缴 2500 元即可；如果不愿做股东，可将股

票卖出，立可得价 17500 元，获净利 5000 元。此外，再送我旅费 5000 元，要我同虞洽卿赴京一行。我研究了日本的取引所法后，同虞到京，经过努力，农商部始制订了“物品交易所条例”，颁布施行。这个条例使虞洽卿主张的多种经营和张謇主张的单种经营的矛盾统一起来，就是说，虞、张所主张的两种交易所都可以办，使它们各得其所。政府方面也有利可图，即条例规定每个交易所应缴资本总额三分之一为保证金，并向经纪人所做每一交易按照规定征收费用。交易所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当时交易营业额颇佳，交易所股票称为本所股，也加入证券市场买卖。开始时每股在 30 元左右，到 1920 年春季已拍到每股 50 多元；及至物品交易所条例颁布后，本所股市价已到 80 元，至年终时每股涨到 120 元。这时每股所欠缴的股款四分之三，即 37.5 元，已全数缴清，交易所已实收资本 500 万元。协进社所有的 3 万股，据我所知，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最多只分给重要社员 15000 股（包括我的 1000 股在内），其余所存 15000 股早已卖到市场上去了。现在为了要缴四分之三的股款，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又将日商方面做押款的 7 万股股票全部赎回而卖掉 3 万股，这样加前存 15000 股共 45000 股，以每股平均获利 60 元计算，共可获利 270 万元。除去（一）日商押款 87.5 万元，（二）还有 4 万股保留下来的股子，每股应缴 37.5 元，共需 150 万元，两共 237.5 万元，尚余 32.5 万元，当然为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所得。至于已缴足 50 元的 4 万股股票，市价每股已值 120 元，共值 480 万元，也为戴、张、蒋等所有了。真所谓空手人翻云覆雨；白手起家，凭空发了大财。

当时我们几个人认为股票价格已达饱和点，不能再有所发展了。于是，洪承祁首先组织 800 万元资金的中易信托公司，

盛丕华代表张澹如去汉口组织武埠地产公司（准备适应建筑粤汉铁路的投机）。又听说北京证券交易所资本仅 10 万元，尽可扩充，结果扩充资本为 60 万元，上海方面参加 30 万元。我自己则向农商部呈准在宁波开办证券花纱交易所，资本为 120 万元。正在各谋发展的时候，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以为他们有实力（有每股 120 元市价的 4 万股股票），因而大做本所股买卖。1921 年年初，本所股每股市价已由 120 元抬高至一百五六十元，到年终时竟涨到每股 200 数十元，真如脱缰之马，横冲直撞。交易所原来订有 120 余条的营业细则（经理事会通过，农商部核准），规定卖主或买主应缴各种证据金，以便防止卖主到期不交货和买主到期不缴款，规定极为严格。但这时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不仅不缴证据金，反而强迫常务理事郭外峰、闻兰亭（他们是管市场业务的）等收受空头支票，充作现金。同时现货与期货（本月期货与下月期货）的差价越来越大，差金打出愈多，致会计上的现金大量支出。交易所由外强中干到捉襟见肘，拖延到 1922 年 2 月，宣告“死刑”，大量股票一旦变为废纸，大富翁变为穷光蛋了。我所经营的宁波证券花纱交易所也受上海交易所倒闭的影响而倒闭，牵涉较广，我为理债而来上海，寓白克路（现名凤阳路）一号。

物品交易所监察人周骏彦（奉化人，是我的同学和老友，也是蒋介石的老师）因套利而欠债 20 万元，到处被逼受困，再三说情，非 2 万元不能过门，急得两次跳黄浦被救。某夜，周由陈纪铭（奉化人，大包作头）陪同到我处来，要我设法救他。我自己也是走投无路，只能劝他慢慢想办法。当时大家都穷得叫救命。移时，日本又汇来 100 万元，交易所的负责人打算开股东会讨论复业。我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就在这 100 万元身上转念头。我的打算是把我所持有的股票先在交易所股东名簿上过了 100 个新户头，然后叫庄之盘（字萃墅，奉化人，

和我在日本同学)雇 100 个人作为股东,在交易所股东开会时到会去质问交易所负责人关于交易所 500 万元资金和各经纪人保证金及各种交易所缴的证据金到哪里去了等等问题,他们如果挽人出来和我谈判,我就有文章可做了。我把这个打算告诉了周骏彦,以免他再去跳黄浦,哪知他当晚就去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也过不了门,第二天就跑来找我,说他经济上实在没有办法,愿意同我合作。我问他希望得多少,他说希望得 20 万元。我一听就当场回绝了。因为日本汇来一共只有 100 万元,现在周骏彦想要 2 万元救他一命还没有把握,蒋介石跑来一句话就要 20 万元,这怎么能与他合作呢?不料蒋介石对我来了一手“釜底抽薪”,他暗地贿送了庄之盘 1000 元,向他拉拢。这样,庄之盘对我的口气就变了。他说:“瑞元(即蒋介石)到你这里来表示合作,你怎么回绝他?”又说:“你初到上海,还不懂上海规矩。虞洽卿不是弱者,在租界上闹起事来,巡捕房不能不管,这就一定要通过法租界的黄金荣。瑞元同黄金荣有交情,你不同他合作,恐怕不容易成事。”我听了这番话,表示同意考虑。庄之盘接着就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说:如果事情搞成功,拿到的钱先救周骏彦的命,其次给蒋介石作川资去广东之用,然后给我。我同意这个办法。第二天,蒋介石在大东旅馆六楼开了七八个房间,约我去谈。我去后,庄之盘又提出:对这次“战役”,由魏任总司令,蒋任参谋长,庄任前敌总指挥,一切要听魏的命令行事。大家都同意这个提议。交易所股东会开会那一天,庄之盘所雇的 100 个人集合起来,我照约定交 60 元给庄,蒋介石再给 100 元,又加发了每人二角的酒钱。让他们酒醉饭饱后,由庄之盘领进交易所股东会会场,坐满了前几排。虞洽卿一看苗头不对,心知有异,就宣布延会一天。他们当晚请李征五(李在辛亥革命时任沪东光复军统领,他的部下有张宗昌,以后在法租界当“大

亨”）商量对付办法，交易所送他 5000 元。李征五当场拍胸，也找了 100 个人来对付。蒋介石看到情况有变，就叫庄之盘“先行退兵”，庄不同意，两个人闹到大东旅馆来。经过谈判，我认为应从长考虑，李征五是熟人，不要紧。而蒋介石却另找了叶琢堂（叶是流氓出身的金融界大亨，他在开赌场时与蒋有交情），由叶琢堂出面去找虞洽卿，说蒋介石没有法子去广东，要虞帮个忙。开始时虞说蒋搞垮了交易所，还要捣蛋，不能同意。最后谈判结果，虞答应可以由交易所拿出 6 万元，但要在蒋离开上海的那一天才能给钱。事情已经定局，不料蒋介石想独吞这笔钱，又叫庄之盘退兵。庄气得大骂，骂蒋忘记了在大东旅馆说过的话，质问他事情办好为什么不征魏某的意见，又说：“若无魏的命令，我照前约是不退兵的。”这样一来，蒋又不得不到大东旅馆来把他同庄之盘龃龉情形告诉我。我以事既办妥，应请庄退兵。庄到大东后，蒋说预备给周骏彦万把块钱，同时给庄之盘几千块钱。正在这时，邵力子为了《民国日报》也到大东旅馆来分了几千元。其余 4 万多元的钱都在蒋手，不仅对我什么也不提，而且蒋乘送客之便，一溜就离开了大东。第二天，庄来告我说，蒋介石已密同周骏彦等去广东了。

上面所讲的事情，一晃已经 40 多年了。不久以前，我碰到当时在大东旅馆当茶房头目的阿春，他还谈起此事，好像当时情景犹历历在目，由此不禁引起我的回忆和深思，并且使我感到无限内疚。

（魏伯桢）

二、蒋介石、张静江关系的演变

张静江是浙江的盐商、财阀和早期的买办资产阶级的代

表，曾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其后的大革命时期及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前一阶段历任国民党党政要职。把这一国民党右翼人物中部分经历和事迹记述下来，或许能够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资料。

家世、出身

张静江原名人杰，静江是其字，浙江吴兴南浔镇人。父张定甫，元配生五子（继侧室所生子女甚多，不殚述）。静江排行第二，故乡里间及张氏亲友熟人都称之为老二先生。张家为南浔刘、张、庞、顾四大巨富之一（号称南浔四象或四大金刚）。前清时先以丝、盐起家，持有巨额盐引票，在浙江、江苏盐区设有盐公堂和盐廩，控制食盐运销；并将吴兴特产辑里细丝贩运出口，销售国际市场。在上海设有通运公司、通义银行和大纶绸缎局，在法国巴黎、美国纽约均设有通运公司分公司，除经营生丝出口外，兼营汇兑和其他进出口贸易，成为当时最早沟通国际资本主义进行通商贸易的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之一。

张幼年虽亦延师攻读诗书，但以出身豪富家庭，娇生惯养成性，及长，功名一无成就。年 20 左右，由父作主与苏州姚姓联姻。姚为苏州道员，虽慕张氏富有，但嫌其无功名而感美中不足，示意张父为子捐一官衔藉使双方门第相称。张父遂以银两 10 万为其捐了二品道衔，和姚氏成婚。

张所捐的官衔是“钦加二品衔，候补浙江实业道”，原来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衔。张的母舅庞元济（字莱臣）早已捐过同样的二品道衔，候了多年，也从未补上实缺。因此，张姚成婚以后也未获得实缺；却因富有，照旧往来于乡里、上海、苏州等地，过着享乐游荡生活。

张早年即成跛足，不良于行，人称“张跛子”。据吴兴南浔等地人说，张早年在南浔镇上一次火警中为保全张家市房，

亲率救火队（张家房产多，有消防设备组成救火队）上屋救火，不慎跌下伤足而成残疾。上海有人说张救火伤足，尚能勉强行走，由于居留法国巴黎期间，生活放浪，沾染花柳病，治疗不慎，伤中坐骨神经，遂成瘫痪痼疾。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5月，杭州人孙宝琦任出使法国大臣，张静江夤缘以一等参赞名义充当孙之随员出国。当时张以这个差使，可以借佛游春，到国外游历，增长些见闻，颇为称心合意，就此欣然登程。

张在随孙出国赴欧轮中邂逅孙中山先生。孙见张尚在青年，官职不高，认为可以通过说服使其脱离清廷参加革命，遂以真名实姓和进行革命推翻清廷等主张相告。张和清廷原无深切关系，也看到当时慈禧太后擅权的腐败情形，对孙主张革命认为有成功希望。张心机一动，觉得此时对孙进行联络，参加孙之组织，一旦革命成功，就可位列显要，遂向孙表示赞同，愿意参加孙之组织，并殷切询问，此去何往，作何计划？孙当告以将经由欧洲再到美国等地向华侨宣传进行募捐，以供国内建立革命武装和活动之用。张即向孙表示愿先以白银3万两助孙，当写亲笔信给美国纽约通运公司经理姚叔兰（张妻舅），凭信一次照付。信交孙中山后，张并密告孙中山，钦差大臣孙宝琦亦同轮赴法，请孙注意，谨慎将事。孙中山对张益觉忠诚可贵，约定日后行踪可由纽约通运公司探询而别。

孙中山到了美国，果然凭信在纽约通运公司取到白银3万两，对张萍水相逢竟能如此热心，颇有好感。

孙宝琦不久回国，张推说巴黎、纽约私人营业要往料理，事毕再回国相从。孙宝琦原知张不过一富家子弟，在幕中无足轻重，亦不坚留，张遂不再回国。由于有纽约通运公司的线索，张不久便找到孙中山先生。孙相见之下，慰勉备至。张亦向孙表示，除效忠于孙之革命外，并愿继续输财相助。孙中山

遂即委张负责筹划和掌管同盟会基金事宜，给予财政部长名义。当时孙中山在海外行动地区较为广泛而流动，亦较秘密，嘱张选择一固定地点以资联系，张就选定法国巴黎。

张在法居留期间，和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过从甚密，和李石曾共同在巴黎开了一个豆腐公司作为掩护。在此时期，张在国内收买了不少宝贵的古董书画和珍宝运到国外盗卖，获取暴利（张胞兄弁群，原已在通运公司兼营古玩书画珍宝输往美国等地有年），过着荒淫享乐生活，且曾娶一法国女子为妻，元配姚氏以此抑郁病瘵而死。孙中山以张原属豪富出身，不疑有他，党中财务，一任张之所为。

辛亥革命后张曾一度回国，仍以同盟会财政部长名义掌管基金收付事宜，并未担任政府职务。辛亥革命失败后，往日本东京、法国巴黎居住。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回粤，张又回国居住上海，挂着中山老友的招牌，经商牟利。1920年张擅自动用国民党大宗基金和虞洽卿等在上海开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当时是中国头一个交易所）进行投机买卖。孙中山事后得知，亦无可奈何。张弟澹如、姻亲周佩箴充当了交易所常务理事。张自己当了监事。陈果夫做了交易所的经纪人。蒋介石、戴季陶那时是依靠领国民党津贴度日的，只附名在陈果夫户名下做投机买卖，将上海的日本取引所的大赌博场面转到英美系买办资产阶级这边来。

当时国民党基金完全由张掌管，国民党有很多散在各地未到粤随同孙中山担任工作和职位的人，经过孙中山批准，可到张处支领津贴和活动费。为了避免租界巡捕房的注意，付账用种种暗号，如火柴代军火，1角代100元等等。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通过中共介绍和苏联代表越飞会见，决意改组国民党，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那时张静江态度极为冷淡，并多次在人们面前以

讥讽口吻肆意诬蔑说：“孙先生要联俄联共，我没有意见，但共产如其可以公妻，这我倒极为赞成！”每次言罢，必附以哈哈大笑。

1924 年孙中山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粤改组国民党，召开改组后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中委名单，由孙中山提名，张亦被提名为中央委员并列入主席团，而张竟不到会出席。当时颇有一些出席代表在会上提出责难，以张一直留居海外和上海，从来没有参加孙中山实际革命工作，今竟提为中委并列入主席团，令人不解。经孙中山反复解说之后，张仍当选国民党改组后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

大革命时期

张静江出身盐商、财阀家庭，又是早期和帝国主义进行通商贸易的大资产买办阶级代表人物，对于推翻清朝统治，虽能接受，对于民主革命已属勉强，对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当然不感兴趣。这是他的阶级本质使然，原是毫不足怪的。因此，他虽然当选为国民党改组后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却居留上海，不问党事。

1925 年春，孙中山在北京医院病危之时，张也从上海赶到北京探望孙病。3 月 12 日孙中山在北京病故，张和谢持、邹鲁、张继、居正、戴季陶等参加北京西山灵前会议，通电反对广州国民党中央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主张恢复国民党原来组织，和共产党分裂，时称“西山会议派”。

当谢持、邹鲁、居正等到上海环龙路 44 号成立国民党伪中央与广东国共合作的中央对抗时，张既不赴粤，亦不参加环龙路组织，留在上海观望。

不久，蒋介石既逐渐攫取了两广实权，为了更进一步抓权植势、排除异己巩固自己地位起见，将留在上海交易所的伙伴

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电召去粤。蒋介石不但在上海和张静江做过交易所的伙伴，又曾向张领过津贴和活动费，且曾和粤系军阀许崇智及戴季陶等拜把结为弟兄（许老大，张老二，蒋老三，戴老四）。蒋最初在孙中山大元帅府当上校参谋也是张所介绍。后来孙中山委蒋为黄埔军官学校副校长，张和戴季陶极力向孙说情，张并为此事亲自赶到广州向孙中山力争，蒋遂被任为黄埔校长。张、蒋关系相当深切，因此张接蒋电后毫不犹豫，欣然赴粤。

张静江因对孙中山先生革命曾有资助关系，一向傲慢自恃，以国民党功臣自居。这次到粤又经蒋多次电邀而来，更觉得和孙中山在日不同，到处摆老资格。蒋原是一个惯于玩弄权术的野心家，觉得张的倚老卖老，这时正可供他利用，做他的挡箭牌，遂对张假意推崇，恭而敬之，称张为“党国元老”，提议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中政会是国民党的决策机构，国民政府一切军政设施组织、人事更动和任免，均须经中政会通过决定。张任中政会主席，正好充当蒋之傀儡。

张静江当了中政会主席，以姻亲周觉为秘书长，事事听命蒋介石，以蒋的意见为意见，甘心为蒋所利用。如 1926 年 3 月间蒋介石一手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张静江就是完全参与其事的。1926 年 7 月开始北伐，张又代理了国民政府主席。（在北伐誓师典礼的摄影上，张坐在正中藤椅上，蒋介石则戎装和妻陈洁如一起站在张后。）北伐开始，张亦以主席身份，随蒋一起北上，由于有共产党的领导，获得广大工农群众的拥护，北伐军节节胜利，北洋军纷纷溃败。蒋介石亦乘机推进，攫取不少新地盘。当时蒋的总司令部组织异常庞大，总司令统揽一切，每到一地，时常出现一些拥蒋标语，如：“军权高于一切”、“蒋总司令劳苦功高”、“蒋总司令万岁”等等，对张静江只字不提，国府主席成为总司令的随员。及 1927 年春蒋

介石到达上海，发动了罪恶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实行清党反共。适谭延闿脱离武汉附蒋，蒋即推谭继任国府主席，将张降为浙江省政府主席。

和反动派内部的矛盾

张静江由中政会主席而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后又降为浙江省主席，心有未甘。张对新职，初则迟迟不到，由蔡元培代理；后虽到任，但仍恋栈中枢，企图搞一个全国性的经建机构。不久蒋介石又以“军政时期”（实即蒋反叛革命后对人民进行血腥统治时期）浙省地位重要，调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浙江省主席，何常住南京。由何之参谋长蒋伯诚代理。

1928年春蒋介石在南京组织所谓五院制国民政府时，张初以为可以元老身份争取监察院长一席。当时也颇有一些以元老派自居的分子如李石曾、丁惟汾、蔡元培、吴稚晖等为张捧场，但蒋终不同意，而以于右任当监察院长。

张在五院落空后，遂争逐全国性的经济建设机构，在李、蔡、丁、吴等元老派竭力支持下，总算当上了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在争逐时，张曾声嘶力竭地露骨表示：“建设非争不可，谁不同意，就是有意破坏建设！”又说：“总理说过的，革命就要建设；不建设，革命就要失败。因此，我党政军都可不管，惟有建设，我是一定要干的！”他惟恐蒋介石再不同意，几次弄到面红耳赤为止。当时五院各有部会外，建设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都是直属国民政府的。但是后来又成立了全国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宋子文充任，建设委员会就形同虚设了。

起初，张对建设委员会原有大欲存焉。他一向倾慕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三井、三菱、大仓等财阀垄断各种工矿企业的事迹，当了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之后，就将所有新建、扩建的工

矿、交通、运输，电气事业，一律划归建设委员会职权范围。在扩建范围内的有淮南煤矿、南京首都电厂和常州戚墅堰电厂。在筹建范围内的有南京到芜湖和杭州到江山的铁路，南京到上海的公路（京沪公路），南京到杭州的公路（京杭国道），南京市公共汽车公司。此外，国内国际无线电广播事业和全国民营电气事业，也统归建设委员会掌管。还创立中央农业实验所（后归农林部接管）及建设银公司（后由宋子文私人接管）。

其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官僚独占资本，正在大肆搜括，与张矛盾很大，逐渐形成正面冲突。由于蒋宋孔陈同时把持党政军大权，对张施以压力，张自难抗衡。国民党第二届五中全会时，就通过一项议案：“建设委员会应将属于各部主管事业分别移交各部接管。”建设委员会原来是实业、农林、交通、铁道、财政等部以外的一个机构，在初是包罗万象，大有高于各部的神气，几乎事事都管，而今一经移交，又成无事可管状态。又因成立了全国经济委员会，职掌和建设委员会相仿，权力却大大超过，因此建设委员会将各项事业交与各部掌管之后，成了一虚空衙门，只有计划，没有实务。

这时，张静江才知道四大家族的厉害，遂将南京首都电厂、常州戚墅堰电厂和淮南煤矿改为民营，以商股形式，组织公司接管；南京到芜湖的铁路改为江南铁路公司；南京市内汽车和南京到杭州的公路（京杭国道）成立江南汽车公司，争取专营权，也组织商股公司接管；浙赣铁路杭州至江山一段划归浙江省办理（当时浙省建设厅长程振钧是张的亲信），借以保留部分权利。此外，还和李石曾等集资创设中国农工银行，张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在上海设总行，南京、杭州、芜湖等地设分行。那时，张在上海、浙江财阀集团方面尚能辗转裕如，南浔巨富在上海的房地产抵押亦可利用，还有浙江兴业等银行

的支助，胞弟张澹如、张让之，母舅庞莱臣、庞赞臣等为其张罗，仍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垄断资本明争暗斗不休，结果是到处碰壁。这使张不得不力求向地方撤退，遂于 1928 年秋第二次回任浙江省主席。1929 年 3 月，国民党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张静江由中央执行委员改为中央监察委员，也是陈果夫在蒋授意下造成的。因张个性很强，调为中央监委以后，不能再在中央执委会上行使表决权。中监会很少开会，而且只有党内重大事件才须召开执监联席会议，监委无实权，等于对张一个警告处分，暗示他谨守范围不要再和四大家族争权夺利。

借口建设，滥征苛捐杂税

在张静江第二次任浙江省主席宣誓就职典礼上，代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前来监誓的是吴稚晖。吴极力称赞张在建设方面的成就，为张捧场。张的答词，由他的干儿子曾养甫代表（曾当时为建设委员会副委员长，并非浙江省府成员，为张代表致答词，实在有些不伦不类）。曾代张表示，将以浙江为实验省，全力搞建设。

张在浙江借口搞建设，首先就是增加苛捐杂税，有所谓“建设特捐”、“建设附捐”、“水利费”、“土地测绘费”等名目，一律在原有田赋项下附加征收。同时发行公债，并向上海、杭州、宁波、绍兴等地银钱业举行抵押借款，以供需应。所增苛捐杂税之中，以“建设特捐”一项最重，按田赋正税每元附加一元四角，附税超过了正税。后来又增一“积谷”项目，每亩征谷二升。商人积谷则在营业税项下附征。国民党政府曾在裁撤厘金改征营业税时，声明营业税不得征收任何附加，张却违例强征。国民党财政部为此一再令张停收，张置之不理。后来又有“教育经费”、“军事特捐”等名目，亦在田赋附加。当时有人估计，田赋正税每元附征税在二元以上，每

亩正附税合计达到一元二角至一元七八角左右。农民负担之重，可见一斑。

张在浙江还发行公路公债，分次向银钱业借款，一律以赋税作抵，部分以企业财产作抵，利息有高至月息一分一厘者，实际是为财阀集团开辟利源（当时上海银行贷放工商业抵押贷款，一般年息一分，至多年息一分一厘，而张则承受月息一分至一分一厘）。张从 1928 年秋到任至 1930 年冬交卸，二年多时间，除苛捐杂税之外，仅公债和借款即达 2000 余万元，张交卸时没有偿清。

张静江原是市侩人物，专以营利为目的，他的所谓建设计划，是以牟取高额利润和早些出本放在第一位。蒋介石原来计划以路矿权利向希特勒法西斯德国借款，从浙江杭州建造浙赣铁路通至南昌，一次建成重轨。而张则坚主先造杭州至江山一段，称杭江铁路，由他向银钱业借款建造轻轨。至于由江山到南昌，轻轨重轨，由蒋去办，张可不问。张认为杭州至江山一段，建造轻轨，成本低，而客货运费收入，短期内即可将借款偿清。他计划以商股形式，组织杭江铁路公司，和已经组织成立的两大公司——江南铁路公司及江南汽车公司，联成一气，列入他的私人企业集团之内。此项办法，蒋大为不满。而张一意孤行，造成二年之后被蒋免职因素之一。

张的建设浙江公路也不能和蒋介石的“军事计划”相配合。蒋当时以“南昌行营”命令浙江省首先建造浙赣边境及浙东、浙南山区公路，限期完成，甚至有“不得贻误军机”等字句。而张则着眼于利润，先以全力建成杭州至绍兴的一段公路（肖绍公路），成为全省唯一有盈余的公路。建成后，又经由公路局长陈体诚、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吴琢之与绍兴商人徐叔荪、金汤侯等勾结，由徐等组织公司，享专营权 30 年。张出售肖绍公路后，将肖绍路从绍兴延伸至嵊县、新昌；又分一路

至曹娥江百官对岸，与百官至宁波铁路（属沪杭甬铁路一段）连接，称上嵊新公路。

杭江铁路，在张离浙后不久，亦由蒋命铁道部接管，并换重轨与浙赣铁路贯通，几乎全部返工，损失亦巨。

措施不当，人民遭殃

张静江在第二次浙江省主席任内，以建设为名倒行逆施，人民大遭其殃，兹择要纪述于次：

1. 蚕桑统制。张到任后，以改良浙省特产丝绸为名，实施蚕桑统制，成立浙江省蚕桑改良场和杭州丝厂，严禁农民饲养土种蚕和缫制土丝，必须全部出卖鲜茧。张氏集团乘此机会压低茧价丝价。农民育蚕无利，相率砍伐桑树，另种庄稼。民营丝厂，制丝赔本，先后倒闭。当时杭州最大的丝厂纬成公司（在嘉兴、上海均有分厂）无法开工，而由张为之发行公司债200万元，以该公司全部财产作为偿债准备（估计全部财产值500万元以上），由浙江兴业等银行承借，勉强维持开工。其尤甚者，当时蚕种必须经过建设厅蚕桑改良场检验合格之后，方准发售。制种场粗制滥造的产品，只要有相当贿赂，就能检验合格；否则即系上品，亦要挑剔留难。蚕种发到农民手中，一经饲养，颇多病害，费工赔本，怨声载道。

2. 盲目推销外国化肥。当时张任内的建设厅（厅长程振钧），为了贪图回佣厚利，向英商卜内门和德商礼和洋行大量购买肥田粉，大力推销，强迫农民施用。农民因不知施用方法，许多地方，施用肥田粉之后，表土硬结，庄稼枯萎而死。

3. 硬性推广稻麦棉种，造成严重减产。张一到任，就要实行农业品种改良。当时建设厅稻麦改良场场长莫某就说该场已经育成几种稻麦改良品种，产量比土种高多少。棉种改良场也说已经育成“百万棉”良种，纤维比土种长一倍多，可纺细